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1.4 / + CBA 21

总号 35690

(查)
1962

強力集团

卡密·威特·吉

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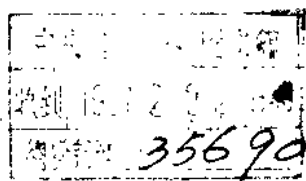
音乐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強 力 集 團

卡 雷 謝 桂 著

叶 松 年 譯



音 樂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7536 22
Т. КАРЫШЕВА
МОГУЧАЯ КУЧКА

本書根据 Музгиз 1954 年版譯出

强 力 集 团

原 著 者 [苏]卡雷謝娃
翻 譯 者 叶 松 年
裝 幀 者 鍾 君 衡

开本: 787×1092 耗 1/32

頁数: 24 印張: 1 1/2 文字: 30,000字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4,360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3号

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單溝沿头33号

新華書店总經售

統一書号: 8026·578 定价 0.24 元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14/c CBA 21
卷号	35690

丙

这本音乐欣赏辅导读物概述了19世纪60年代里俄罗斯作曲界的一个创作集体“强力集团”的形成经过，分别介绍了重要成员巴拉基列夫、居伊、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等人的生平和创作活动。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对“强力集团”为了在音乐中树立民族风格、人民性、思想性和现实主义而斗争的经过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強力集團”，“新俄羅斯學派”，“巴拉基列夫小組”——這些都是一個作曲家集團的名稱，這些作曲家給俄羅斯音樂界帶來了光榮和驕傲，創作了不朽的古典音樂藝術作品。蘇聯的聽眾懷著熱愛的心情提到李姆斯基-柯薩科夫、莫索爾斯基、鮑羅丁、巴拉基列夫、居伊的名字。莫索爾斯基的歌劇《鮑里斯·戈都諾夫》，《霍宛希那》，鮑羅丁的歌劇《伊戈爾王》，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歌劇《普斯科夫姑娘》，《五月之夜》，《雪女郎》以及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一些其他的歌劇是蘇聯歌劇院經常演出的劇目。這個天才集團的交響樂作品：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安塔爾》和《舍赫拉查達》，鮑羅丁的《勇士交響曲》，《中亞細亞的草原上》，莫索爾斯基的《荒山之夜》，《莫斯科河上的曙光》，巴拉基列夫的俄羅斯主題序曲和《塔瑪拉》——這些也是人民所熱愛的和經常排入音樂會節目中的作品。室內樂作品，如鮑羅丁的四重奏，巴拉基列夫和莫索爾斯基的鋼琴作品，居伊的提琴曲以及所有這些作曲家們的許多浪漫曲也經常地在音樂會上可以聽到，在業餘的音樂會上，在家庭中也經常被演奏。這些作品雖然是在半世紀多以前的年代里寫成的，但它們至今還到處傳唱，激動著聽眾，受到我國全體人民的熱愛。

這一天才的五人團的創作和活動多年來曾經給俄羅斯的音

乐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我们当代的人——苏联的作曲家的任务是在向俄罗斯古典音乐家学习的同时，要继承他们的事業，遵循他們的遺訓，并發揚他們的傳統。日丹諾夫在苏联音乐工作者會議上說过：“同志們，我們希望，我們热烈地希望我們將有自己的‘強力集团’。过去那个‘強力集团’曾經以它許多有才能的作曲家震惊全世界并为我們人民博得光荣。我們希望我們自己的‘強力集团’能比过去的‘強力集团’人数更多，力量更大。”

在談論参加巴拉基列夫小組的作曲家的時候，我們可以分別地加以介紹。关于他們当中每一个人，大家已写过不少的專門性著作——从通俗的小冊子一直到長篇的研究論文——作了評介。但他們的历史特征是在于，它不是一个單純地互相以友誼結合起来的音乐家集团，而是一个創作的集体，是一个由共同的思想團結起来的几位当代进步艺术家所組成的战斗的友誼同盟。

新俄罗斯学派的作曲家們是作为一个強大的社会文化力量，在19世紀80年代的社会运动高涨的新条件下出現的，但他們又是前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的先进思潮的直接繼承者。他們完全承受了在普希金、果戈理、格林卡、达尔高梅斯基的不朽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对待艺术的嶄新态度；完全承受了那些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优秀代表——卓越的批評家和政論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和赫爾岑以及稍后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明确規定了的对待艺术的嶄新要求，把它們当作新的美学原則，艺术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原則，艺术为最广大的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原則。車尔尼雪夫斯基以自己的論文《艺术和现实的美学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紀元，他宣称，对于艺术來說，最美好

的就是生活，艺术家必須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反映生活，成为生活現象的裁判人。

但是社会上的民主階層的这些要求是与統治階級，特别是与宮廷貴族的上層分子观点相抵触的，宮廷貴族的上層分子認為艺术是消遣的工具，只有少数的“选民”才配享受。歌剧院，音乐廳，城市的一切音乐生活的領導权，資料，全部操縱在他們的手里，在他們的管制之下。

他們从国外招聘了意大利的歌剧团，法国的輕歌剧团，出色的歌唱家和欧洲著名的音乐家。但这些社会階層对祖国艺术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他們对建立在民間基础上的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感到不可理解，認為这种艺术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敌对的东西。然而在当时的俄罗斯，在社会舞台上，已經出現了代表自由民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股新兴的文化的力量，这些知識分子在文化和科学的高潮中，在象征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特点的艺术繁荣中曾經起了巨大的作用。無論我們提到俄罗斯文化的那一个部門，我們一定都会到处遇到那一个时期的一些最卓越的活动家們的名字。在化学方面有孟德列耶夫，布特列罗夫和鮑罗丁；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柯瓦列夫斯基和密契涅科夫兄弟；在数学方面有著名的索菲亞·柯瓦列夫斯卡婭；在医学方面有鮑特金和謝琴諾夫；在文学方面有年青的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音乐方面有“強力集团”的作曲家們；在繪画方面有画家集团——以克拉姆斯柯依为首的流动展覽会的組織者們。就是这些人組成了先进俄罗斯知識分子的队伍，就是这些人为了年青的俄罗斯科学的繁荣和确

立俄罗斯艺术的独特性参加了当时反对反动力量的残酷斗争。由于学术界、文化艺术界人士相互間經常的友誼交往，由于思想一致和目的明确，相互的支持以及各个創作集体的团结，他們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集体性是19世紀下半期的先进艺术家和科学家們活动中的特征之一，多方面的兴趣和多样化的著述也同样是他們的特征。

所有俄罗斯的先进的青年都力圖以自己的活动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他們秘密地閱讀赫尔岑創办的杂志《鐘》，討論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論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办》是优秀人物的必讀之書，全心全意忠实于革命事業的青年拉赫美托夫成为人們敬愛的英雄。青年們組織起来，聚会在一起不仅为了尽情地热烈爭論，而且还力求“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私生活，仿效車尔尼雪夫斯基所闡明的形式，“公社”也組織起来了。莫索尔斯基曾在这一种大学生团体里生活过一个时期，那时人們对自学和教育的任务是十分重視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过：“到目前为止在真理、艺术、科学的崇高思想面前，俄罗斯人的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促进它們在自己祖国里普及……这一事業目前需要，大概將來还長期地需要我們祖国最有才干的兒女發揮一切智慧和精神力量。”

他这些話被当时的青年奉为应向何处并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直接的指示。我們祖国最卓越的学者們同样認為給广大群众作免費的通俗演講，使群众熟悉現代科学的成就，滿足群众对知識的渴求，都是自己的責任；当时建立了許多民間学校，女子高等学校在俄国第一次出現了（阿·波·鮑罗丁并且是1870年在

彼得堡开办的一所女子高等講習所的积极組織者和教师)。

在音乐方面，19 世紀的下半期同样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繁榮时代，就极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是一个涌现了许多最卓越的音乐文化活动家的时代，这些人的肩背上負担着解决历史进程本身在他們面前提出的巨大任务。家庭演奏的范围，宫廷里的用来消遣的演奏会和戏剧生活的圈子已經变得难以容忍的狭窄。音乐必須成为广大人民的财产，必須在国家 and 整个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創作問題，演奏問題，培养俄罗斯音乐家干部問題，音乐啓蒙活动的任务問題被当作巨大的全民的任务提出来了。在这一时期优秀的鋼琴家，音乐文化事業方面的孜孜不倦的創立者安东·魯宾斯坦和尼古拉·魯宾斯坦展开了自己的活动，在同一时期彼得·伊利奇·柴科夫斯基也活着，进行了創作活动。老一輩代表人物还在世，并积极地参加了音乐活动，其中有格林卡的直接繼承者，著名歌剧《水神》的作者达尔高梅斯基和卓越的音乐批評家兼作曲家謝洛夫在 60 年代开办了第一批的音乐学校：隶属于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学校——安东·魯宾斯坦創立的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院(1862)，由巴拉基列夫和洛馬金創办的免費音乐学校(1862)，还有尼·格·魯宾斯坦和彼·伊·柴科夫斯基手創的莫斯科音乐学院(1866)以及某些省城里的音乐学校。

*

*

*

一些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全然無知的青年参加了巴拉基列夫的小組。他們热爱音乐，虽然他們中間每个人都有另外的职业。居伊刚从軍事工程学院畢業，鮑罗丁是一个軍医，莫索尔斯

基是近卫軍的軍官，李姆斯基-柯薩科夫是个海軍軍官。只有巴拉基列夫一个人認定自己的職業是音乐。著名的艺术学專家、批評家、政論家符拉基米尔·华西里也維奇·斯达索夫是这些作曲家們的亲近的朋友和这个小組的重要成員。他不从事作曲，但作为一个精通艺术的能手，老練的音乐鑑賞家，他是年青朋友們的鼓舞者和热心的援助者。

除了居伊是由著名的波蘭作曲家斯坦尼斯拉夫·莫紐西柯教过他一些課程外，他們多多少少都在普通教員的指导下受过家庭的音乐教育。同时應該提到彼得堡的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老师弗·阿·加渥耳，他不但給予自己的學生以良好的影响，而且还介紹他認識巴拉基列夫。強力集团成員們的創作个性是按不同方式形成的，在其成熟时期的表現也各不相同，但这些青年人的观点，同情心，志向以及世界观却有許多共同之点。他們都是生長在远离京城的俄罗斯外省地区，[●] 在那兒最初的音乐印象是和家庭演奏以及傾听民歌有关的。年青的音乐家們善于敏感地諦听自己人民的歌声，善于覺察到民間歌曲的不朽的美妙。格林卡和达尔高梅斯基的音乐，以及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文教会了他們理解民歌的深奥的意义。关于別林斯基对青年的影响，斯达索夫說得好：“別林斯基畢竟是我們真正的老师。任何的学校，写作訓練班，考試，以及其它等等對我們的教育

● 巴拉基列夫于1835年生在尼茲尼·諾夫哥羅得城（現今的高尔基城），居伊于1835年生在維利諾，莫索爾斯基在1839年生于靠近普斯科夫港灣的卡列夫村，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在1844年生在靠近諾夫哥羅得海港的齊赫汶城，只有鮑羅丁于1833年生在彼得堡。——作者注。

和發展所起的作用都比不上別林斯基一個人以及他每月發表的論文所起的作用來得大。我們在這里不會識別出當時俄羅斯的其它東西。當然，別林斯基的巨大影響無論怎樣也不只是关系到文學一個部門；他擦亮了我們大家的眼睛，他培養了性格，他用強有力的手砍除了宗法的成見，在此以前這種宗法的成見一直是整個俄羅斯賴以生存的東西。他促成了健康有力的心智上的活動，這個運動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才得到了鞏固和高漲。而我們都是他直接的學生。”

認為巴拉基列夫小組的成員是作曲家，那是遠非全面的說法。他們的興趣是極其多方面的，並且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從事了好幾種工作。假如觀察一下他們的活動表現在哪些文化領域中，在哪些形式中，他們感到興趣的是哪些問題，他們所接觸的是哪些人，那末就會清楚地知道，“強力集團”是處在當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最先進，最活躍部份的前列。

鮑羅丁是一位卓越的化學家和社会活動家，他和那些俄羅斯科學巨擘德·伊·孟德列耶夫，阿·姆·布特列羅夫，伊·姆·謝琴諾夫，阿·奧·柯瓦列夫斯基，斯·勃·鮑特金有着友好的交往。莫索爾斯基的第二次見面是在外科醫學院一位傑出的教授斯·阿·伊凡諾夫斯基的家裡。鮑羅丁認識烏克蘭的女作家馬爾科·華夫巧克。他是在著名的醫師斯·勃·鮑特金的家裡和巴拉基列夫相遇的。

居伊在長時期中是以音樂批評家的身份出現的。此外，他還是一個最卓越的軍事工程的理論家，筑城學方面大量著作的作者，三個學院的教授。他們倆直到去世為止既在科學方面又在藝

术方面工作。其余的三人则完全献身于艺术，但是行会般的狭隘观点对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莫索尔斯基显示了巨大而多方面的兴趣。他研究历史、文学、哲学。当他年青的时候在他的周围有一些先进的，具有民主意向的青年人，虽然这些青年并非知名人士，但是按斯达索夫的话来说：“是聪敏而有教养的人”。在自传中，莫索尔斯基提到自己和舍甫琴柯，屠格涅夫，历史学家考斯托马罗夫，作家格里高罗维奇，皮萨斯基等人认识一事。他在晚年和画家列宾，雕刻家安托考利斯基以及其他的人有着友好的交往。

巴拉基列夫和李姆斯基-柯萨科夫为教育工作，音乐社会活动贡献出了许多力量，他们并且是当时卓越的指挥家。

符拉基米尔·华西里也维奇·斯达索夫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在一生中，看到了从格林卡起直到格拉祖诺夫为止的俄罗斯古典音乐艺术的繁荣。他本人认识格林卡，青年时代他曾和谢洛夫有过多年的友谊关系。他和达尔高梅斯基一直是过从甚密的朋友。斯达索夫常以艺术和音乐批评家的身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支持音乐和绘画中一切独特的、民族的、真实的与生动的东西。他深信新思潮会在俄罗斯音乐中获得胜利，并竭尽全力促成这一胜利的到来。他和巴拉基列夫尽管有着年龄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友谊早在1855年就已开始了，并且他对青年作曲家以及后来对小组的其他成员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是新美学原理的热情的宣传者。画家伊·叶·列宾——斯达索夫的知友——这样说过：“……斯达索夫发出了崭新的、民族的怒吼，在他的论证里，觉察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活力，斯达索夫的宣传鼓

勃，正如春雷和富有生命力的陽光一樣吸引着藝術里的新生嫩芽。”

斯達索夫的交際範圍是如此廣闊，因此要列舉出和他會晤過的，通信來往過的，並在工作上得過他幫助的人，這就意味着要舉出彼得堡的學術界和藝術界的所有先進的知識分子。

巴拉基列夫小組並不是一下子就組成的，最初是由遷居到彼得堡不久的米里·阿歷克賽維奇·巴拉基列夫和符拉基米爾·華西里耶維奇·斯達索夫組成了它的核心。他們是在格林卡的家里認識的，並且很快地結成牢固的友誼。共同的思想趨向和對格林卡天才的熱烈崇拜使他們親近起來。當時巴拉基列夫已是一位作曲家了，他以鋼琴家的身份出現在音樂會上，同時他已有一些樂隊的工作經驗。他曾在尼茲城的一個地主——藝術保護者，內容豐富的音乐著作（莫扎特和貝多芬的傳記）的作者阿·德·烏斯捷格雪夫的家里擔任指揮。烏斯捷格雪夫還帶巴拉基列夫來到了彼得堡，並使他和格林卡認識。

格林卡和巴拉基列夫來往沒有多久，總共只有幾個月，但他給予巴拉基列夫的才能以應得的估價，並把他當作志同道合的人。格林卡對自己的妹妹雪斯塔考娃說過：“一開始我就發覺到巴拉基列夫在有關音樂方面的觀點和我如此的接近。”^① 格林卡領導巴拉基列夫進行創作事業，給他以指示，把西班牙民間進行曲的主題贈送給他，後來年青的作曲家遵照偉大導師的指示，在自己的序曲中應用了這支進行曲。這一份禮物是在1856年4月

① 《俄羅斯音樂報》1910年第41期，863頁。——作者注。

26日，格林卡動身到國外去的那一天贈送給巴拉基列夫的，以後格林卡就沒有再回祖國。在1857年2月3日，他死於柏林。

和格林卡的交往，巩固了巴拉基列夫的信念，給他的事業指出了方向和前途。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巴拉基列夫會這樣勇敢地担負起了青年音樂家集團的領導者的責任。

格林卡逝世以後，俄羅斯音樂的先進力量開始聚集在阿力山大·賽爾蓋維奇·达尔高梅斯基的周圍。作為格林卡的朋友和繼承者，达尔高梅斯基以父親般的關懷對待青年作曲家們，並且促進了小組的形成。在他的家裡莫索爾斯基會見了巴拉基列夫和居伊，並且參加了他們的集團。

這樣，在1857年已有三位作曲家了：巴拉基列夫，居伊和莫索爾斯基（後者當時才十八歲）。他們在米利·阿列克賽維奇的領導下，醉心於研究音樂，米利·阿列克賽維奇和自己的青年朋友重複地四手聯彈了許多古典作品，其中有貝多芬的全部交響樂，舒伯特、舒曼、格林卡的許多作品，同時解釋這些作品是怎樣寫成的，它的形式如何，並且還探究這些作品的技術性質的細節。課程是常在友誼的交談中進行的。斯達索夫也常常參加他們的聚會，特別是當分析小組成員的作品的時候。

1861—1862年的冬季，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和他們結合在一起。他是他們中間最年青的一個，當時這個十七歲的热情的少年立刻完全被巴拉基列夫所吸引（巴拉基列夫比他大八歲）。

“巴拉基列夫是像對待兒子和學生一樣地愛護我，而我簡直是愛上他了。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天才超過了一切可能的界限，而他的每一句話和見解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絕對的真理。”

在友誼的早期，巴拉基列夫小組的成員們很多是進行了自學；在自學過程中，巴拉基列夫和學識淵博的斯達索夫給予他們以巨大的幫助。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回憶道：“和巴拉基列夫認識以後，我首先聽到的話是，應該閱讀，關心自學，熟悉歷史、熟悉優美的文學和評論。這一點我得感謝他！”

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在他化了多年時間寫成的一部著名的自傳《我的音樂生活》里給我們留下了回憶他青年時代朋友的寶貴的幾頁，給我們留下了他們外在的和內在的性格的鮮明特點。當談到巴拉基列夫時，他寫道：“作為一個優秀的鋼琴家，卓越的樂譜閱讀者和傑出的即興作曲者，由於生來就對和聲學和音響學有正確的聽覺能力，他具有一種一部份是天賦的，一部份是通過自己努力嘗試的實踐而獲得的作曲技能……作為一個評論家，即技術的評論家，他是令人驚嘆的。他會立刻覺察出任何一點技術上的瑕疵或是謬誤，他能立刻看出形式的缺陷……並馬上坐到鋼琴旁邊，即興地彈奏起來，指出應該如何修正或改寫這個作品。”“人們毫無異議地傾聽他的意見，因為他的個性感召力是極其巨大的。他年青，長着一雙美妙、靈活、熱情的眼睛和一撮鬚亮的鬍子，講起話來堅決，威嚴和直率……。”

當然，這裡所發生的影響不僅是在於巴拉基列夫的講話是怎樣的（堅決、威嚴、直率），而是在於他倒底講了什麼，他号召自己年青而有才能的同志們做什麼，這些同志從他的談話里，期待著新穎的真理，並領會他的眾多的意見。

李姆斯基-柯薩科夫接受了巴拉基列夫的意見，毫不猶豫地從事交響樂作品的寫作，居伊和莫索爾斯基忙於構思歌劇，居伊

在那時已經是兩部獨幕歌劇(《高加索的囚徒》(1857—1858)和《總督的兒子》(1859)的作者,並已開始寫作自己最著名的歌劇作品《威廉·拉特克利夫》,這是以巴拉基列夫向他提供的海涅的民族敘事詩為題材的。莫索爾斯基正醉心地為索法克的劇作《埃及皇帝》譜曲,但很快地他又被戈斯塔夫·弗羅貝爾的小說《薩拉姆保》的題材所吸引(但這部歌劇沒有完成)。小組的領袖巴拉基列夫本人在60年代初致力於為莎士比亞的悲劇《黎爾王》配樂,並考慮寫作一部俄羅斯的神話歌劇《熱帶鳥》,但這個意圖並沒有能實現。這是一個創作的摸索時期,並且明顯地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年青的作曲家們都傾向於宏巨的作品形式,傾向於充滿戲劇性,熱情和浪漫主義的歷史性題材。

討論作品,熱烈地交換意見,相互的批評,有時批評得很尖銳,這些都大大地促進了青年作曲家們的創作的成長。由於創作聚會,共同工作、座談和爭論在青年們中間產生了親密的友誼關係。在藝術史上,從未有過先例,像“強力集團”作曲家之間有着那樣慷慨的友誼,相互間忠誠的關懷和始終不渝的信賴。每個人的成功都是共同的歡樂,失敗是共同的苦悶。1862年,當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出國航行的時候,朋友們沒有和他斷絕聯繫,和他進行了愉快的通信。巴拉基列夫勸他繼續致力於交響樂創作,並供給他以行板的主題。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在船隻停靠在英國海岸的時候寫完了這部份之後,便從郵局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了巴拉基列夫。

就在這一年,鮑羅丁加入了這個小組。在第一次的晚會上他就聽到了由巴拉基列夫和莫索爾斯基四手聯彈的《缺席者的交

响乐》，也就是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交响乐。鲍罗丁对作品的美妙讚嘆不已，并指出莫索尔斯基（以前鲍罗丁曾听过他的演奏）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已有了显著的成長，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作品演奏得既有光彩，也有深刻的智慧和活力。

当时，鲍罗丁已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他是一位外科医学院化学系的副教授。他进入了音乐的领域来探索自己的道路。鲍罗丁醉心于室内乐，他本人在室内乐团中演奏长笛和大提琴，在和巴拉基列夫小组组员们相遇以前，他已写了一些室内乐作品。他曾经和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谢洛夫相识，谢洛夫向他介绍了格林卡的作品，这些作品深深地激动了这个青年的音乐家兼教授。一个偶然的机会把鲍罗丁和巴拉基列夫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是否可以把这两位先进的青年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鲍特金医生家中的会见与相识当作是偶然的事情呢？）鲍罗丁进入小组后，立刻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和朋友，这些人深深地讚賞鲍罗丁的巨大的天才，并热烈地爱上了他。

这样，到了1863年，这个著名的音乐家小组就组成了。格林卡的深刻而富有人民性的、真挚的作品是这些青年作曲家们的榜样和理想。“强力集团份子”终生都和格林卡保持着血肉相连的感情，并且崇拜他的天才，他们把自己当作是格林卡遺訓的直接繼承者。格林卡的名字被写在小组的旗子上。他们非常珍視和达尔高梅斯基以及經常虔誠地紀念她哥哥格林卡的雪斯塔考娃等人交往，这些人好像是一种把他们和偉大的先驅者联接在一起的活的环节。宣傳格林卡的作品成了他們共同的事業，他們神聖的職責。他們积极地参加雪斯塔考娃發起的格林卡作品的再